稀有 B 衰變數據對因子化與 Y 相角的啟示

台灣大學物理學系 侯維恕

1997 年初位於康乃爾大學的 CLEO 實驗組宣佈發現數個無魅 B 介子衰變, 其中以 B η' K 分支比為 8 ×10⁻⁵ (亦即每 12500 個 B 衰變中有一個)最為突兀,因為事前之理論值雖參差不齊,但未有超過 10^{-5} 者。尤有甚者,B \rightarrow η' K 加數 (0 至 4) 個 π 介子,即使要求 η' 之動量大於 2 GeV/c,其分支比亦接近 10^{-3} 之多。這些奇特現象,指出「強企鵝」圖之振幅相當大。

1997 年尚有另一條脈絡,同樣與「強企鵝」圖有關,三年來藉數據的累積,確實增進了我們對 B 衰變動力學,甚至於對標準模型中唯一之 CP 破壞參數 - (- arg Vub)相角 - 之了解。

一、緣起:1997 「強企鵝」年

1997 年初,CLEO 公佈 B^0 $K^+\pi^-$ 分支比小於 B^+ $K^0\pi^+$,分別約為 1.5×10^{-5} 及 2.3×10^{-5} 。這個觀測激發了 T. Mannel 及 R. Fleischer 這兩位德國人的探討,指出 $K^+\pi^-$ / $K^0\pi^+$ 分支比應大於 $\sin^2\gamma$,因此,CLEO 數據已開始提供對 CP 破壞相角 之限制!這個宣告,一方面引起不少人指出其漏洞,但也造成理論家風起雲湧般的討論。

我們當時走的方向,與多數人有異。當時有個傳言,說 CLEO 僅見 K+π事例 (K-π+? 我的線民沒說), 亦即 CP 破壞百分之百(100%)! 俗云謠言止於智者,但那是指具破壞性、傷害性之流言。在這裡的傳言 讓我們稱之為內部快訊吧! 正屬於激發理論家之想像與思考的那種,一般而言對人類至少是無害甚且有益的。因此,我們著手探討。

1997 年,時值國家理論中心成立,我與中研院鄭海揚教授及成大李湘楠教授共同提出BCP 與 PQCD 之 Topical Program,於 1998 年 2 月至 6 月執行(原提計劃為期兩年),我並適時自澳洲墨爾本邀請何小剛教授(後聘台大)加入。我與何小剛並當時於中研院任博士後之楊桂周教授(現任教於中原大學)一同研究超越標準模型之物理引發 B Kπ衰變中極大 CP破壞之可能性。為了這個目的,我們探討了 B° K+π及 B+ K°π'之 γ 依存性,指出標準模

型之 CP 破壞不會大過約 10%, 而即使放入一個大的 $K^+\pi^- \leftrightarrow K^0\pi^0$ 「終態作用」(FSI) 散射相角 ,亦不能使 CP 破壞大過 30%。我們再引入某種新物理,其 CP 破壞相角 為任意可調,我們以數字指出 CP 破壞可大於 50%。在這個工作[1]中,我們僅僅把 γ (弱相角)及(強相角)參數當遊戲來玩,卻種下了日後發現之伏筆。

二、契機 1998:γ 相角與電弱企鵝之重 要性

1998 年暑假,我們的「新物理」討論大致完成,我決定看看 CLEO 又有些什麽新結果。上網一查,發現新測量到了 B^+ $K^+\pi^0$,其分支比 1.5×10^{-5} 大於 $K^+\pi^-$ 之 1.4×10^{-5} ,而原本大於 $K^+\pi^-$ 之 $K^0\pi^+$ 則降為與 $K^+\pi^-$ 相當。我立刻知會何小剛,我們興奮的趕緊在兩週內寫出一篇文章 [2]。何小剛執意於他 1995 年的得意之作,強調「電弱企鵝」必須加在計算中,方能增強 $K^+\pi^0$ (但仍不能解釋 $K^+\pi^0$ $K^+\pi^-$),而我則強調,雖然 Fleischer-Mannel 限制因 $K^0\pi^+$ 不再大於 $K^+\pi^-$ 而失效,然而,我們需要相當大的 γ 角方能將 $K^+\pi^-$ 及 $K^+\pi^0$ 衰變率放大到與 $K^0\pi^+$ 相常

實在說,在這個階段我仍將 γ 參數對 B K 衰變率之影響略以兒戲視之,沒那麽當真。而我在撰寫上述論文的前後,利用台大高能組參與日本「B 介子工廠」Belle 實驗已進入緊鑼密鼓之硬體裝設最後階段,於 1998 年 8 月底赴美 Brookhaven 國家實驗室(BNL)及康乃爾大學訪問半年。這次由國科會資助的出國研究,使我與 CLEO 數據「面對面」接觸,對我造成不少的衝擊。

三、突破: B $K\pi$ 強於 π π 的啟示

 B^0 h^+h^- 早在 1995-96 年便已有徵兆,但 CLEO 實驗因為缺「粒子鑑別器」(2.5 GeV 動能之 K^+/π^+ 極難分辨),只好不斷改進分析方法並累積數據量。到 1997 年 CLEO 公佈觀測到 B^0 $K^+\pi^-$ 時,其言下之意便是 $K^+\pi^-$ 衰變率大過 $+\pi^-$ 衰變率。這個結果告訴我們企鵝

圖振幅 P 在 B $K^+\pi^-$ 衰變中大過樹圖振幅 T。 因為,在 T 振幅壟斷的極限, B^+ $K^+\pi^-$ 之衰 變率將僅有 $\pi^+\pi^-$ 衰變的大約 20 分之一,顯然 與事實不符。

到了 1998 年, B^0 术术 衰變還是沒看到,顯示其衰變率比 $K^+\pi^-$ 小了不少。這就令人費解了。若 $\pi^+\pi^-$ 僅比 $K^+\pi^-$ 小一點,則或許是控制其衰變之 V_{ub} 參數,其絕對值略小於我們原本所以為的。但 $\pi^+\pi^-$ 衰變若遠低於 $K^+\pi^-$ 衰變,要把 V_{ub} 降太多,我們便要有別的麻煩!

我於 1998 年 8 月底到達 BNL 安頓,於 9 月中旬初次赴康乃爾,開始了我每兩週一次的定期訪問。CLEO 實驗組接納我成為「Visiting Member」(直到 1999 年底),使我得以參與CLEO 內部一切活動,讓我大開眼界,知道了很多物理分析的秘辛與細節。另一方面,德國的 Ali, Kramer 及呂才典(AKL),以及鄭海揚教授的 CCTY 研究群(BCP Topical Program 的一部份),分別已將 B 介子之 70 幾個二體衰變之因子化計算完成了,不但提供數值表,亦提供公式。

有了這兩大方便,我常在定期訪問康乃爾 CLEO 實驗組時,面對 CLEO 數據,思考其意義。11 月份某一夜,在反覆推敲與對照之後,我注意到了一件事情。後來我對 CLEO 的朋友說,那一夜是我近來最受用、最充實的一夜。

我注意到了什麼呢?大約在 1997 年,主 要是因 B。介子混合強度下限在實驗上的推展, 有一批人從事 Cabibbo-小林-益川矩陣 (CKM; 前述 V_{ub} 即為其中一重要矩陣元)么正性分析 , 推斷 γ 大小當在 60° 上下,且至為精確。這個 結果,雖然其方法備受質疑,但卻深入人心。 譬如我們在作「新物理」分析時, 便將 γ 設 定在 60° 。我首先注意到, π π 衰變強度大約 等於 K 的「印象」, 其實是因為大家 (如 AKL 及 CCTY) 以 $\gamma = 60^{\circ}$ 為基準的緣故。我們在前 面已注意到,若 $\gamma > 60^{\circ}$, $K\pi$ 衰變率增加特別 是進到第二象限約 180° 時達到極大值。但我 們發現,以我們對 CKM 矩陣之已知性質,可 推論 B⁰ $\pi^{+}\pi^{-}$ 衰變率之 γ 依存性與 B^{0} K+π 衰變率恰成負相關(negative correlation), 亦即當 $K\pi$ 隨 γ 增大而上升時 $, \pi\pi$ 則下降 ,而反之亦然,如圖一所示。我們找到了 $\pi \pi$ 遠 小於 Kπ 的自然機制。

我第二天與康乃爾大學主導 Κπ/ππ分析

之 J. Alexander 教授送 e-mail, 問他除了 $\pi^+\pi^ \pi^0\pi^0$ 散射把 $\pi^+\pi^-$ 「吸收」了的怪異可能外,他還想不想知道別的辦法。他答曰:想死了!我便到他辦公室,講解給他聽,他十分高興說不知為何沒有聽人提起,並給我不少建議。

我們當時除了指出 $\pi\pi << K\pi$ 表示 γ 相角在第二象限而非第一象限外,也在 $K^*\pi$, $^0\pi$ / π 及 $^{\pm}\pi^{\mp}$ 等衰變式中尋得旁證。12 月至 1月,雖因寫「卓越計劃」而延遲,但我終於在2月份離開 BNL 前寫出論文 [3]。

讓我們略略說明這當中的基礎物理。如圖 二所示, B^0 $K^+\pi^-$ 及 B^0 $\pi^+\pi^-$ 之樹圖振幅 分別正比於 $V^*_{us}V_{ub}$ 及 $V^*_{ud}V_{ub}$,而圈圖則正比於 $V^*_{ts}V_{tb}$ 。前兩者同相位(均正比於 γ)而後 兩者則因已知(「粒子數據群」相角約定下) $V^*_{ts}V_{tb}\cong V_{ts}$, $V^*_{td}V_{tb}\cong (1 -i\eta)\times V_{us}V_{ub}$,而 1- >0 ,所以我們很快看到,當 相角使 T-P 干涉在 B^0 $K^+\pi^-$ 為建設性時,在 B^0 $\pi^+\pi^-$ 則成為相消性,亦即前述 $K^+\pi^-$ 與 π^+ 一對 γ 依存度的負相關。我們也馬上理解到 為何圖一 $K^+\pi^-$, $K^+\pi^0$, $\pi^+\pi^-$ 等曲線大致為 γ 角之三角函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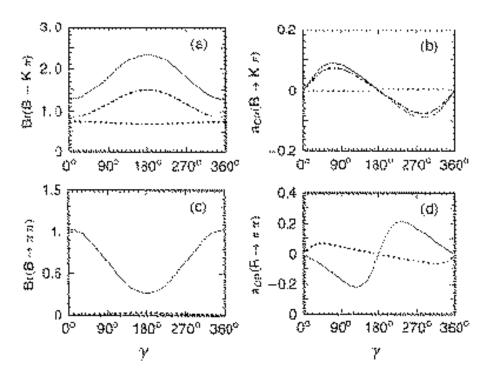
對實驗數據能夠提出最直觀而簡單的解釋 是令人欣慰的。

四、驚愕:「因子化」在二體無魅 B 衰 變中成立!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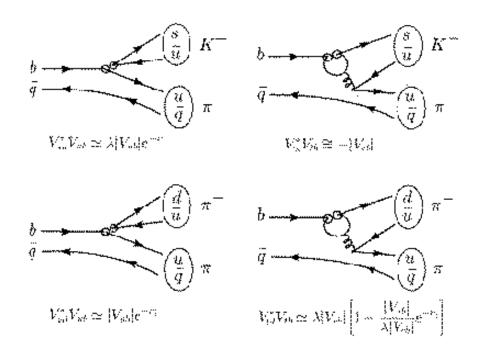
前述之觀察雖然簡單扼要,但我必須說明 我在 1998 年 11 月所受之震撼及想法上的改 變。

圖二所繪,實為「因子化」B 衰變圖像,亦即幾乎以夸克層次之物理來解釋所觀測到的現象。我在 10 餘年前開始從事 B 物理研究時,集中在所謂「通括性」(inclusive)衰變,因為藉著「表裡(對等)」性(duality)之論證,這些過程大致可與夸克層次之反應畫上等號。但我堅持未再去深入討論「特定性」(exclusive)衰變,如 B^0 $K^+\pi^-$,因為實在看不出夸克層次的現象如何能透過「強子化」(hadronization)之迷霧(或,「毛玻璃」)而顯出來。強作用具非微擾特性,太難了。

回顧起來,我在 1998 年初的切入點 [1],是玩「新物理」遊戲,接受「因子化」為工具討論 B^0 $K^+\pi^-$ 等對 γ 之依存度。暑假時仍是玩票性的指出 γ 依存度對解釋 $K^0\pi^+$ / $K^+\pi^-$ 之功用[2]。直到我們在 CLEO 實驗組,以較宏觀



圖一 B $K\pi$, $\pi\pi$ 衰變率及 CP 不對稱 a_{CP} 之 依存性。圖(a)、(b)在 = 180 0 自上至下為 $K^{+}\pi^{-}$, $K^{0}\pi^{+}$, $K^{+}\pi^{0}$ 及 $K^{0}\pi^{0}$, 圖(c)、(d)則為 $\pi^{+}\pi^{0}$, $\pi^{+}\pi^{-}$ 及 $\pi^{0}\pi^{0}$



圖二 B⁰ K⁺ 及 ⁺ 衰變之樹圖與企鵝圖振幅及相關之 CKM 矩陣元

的態度將已知之「因子化」公式與已量得的數據一一檢示比對時,驀然發現他們都若合符節 但必須把 γ 角從第一象限調大至第二象限。 這對我是個極大的衝擊,我把它比為一個 「宗教性」的感化經驗:我從全然不信「因子化」會成立,轉變成相當相信因子化在(未受打壓的)B介子無魅衰變中大致成立。這個轉變,我把它反應在 1999 年 2 月份投出的文章

中 [3]: 若 $\cos \gamma < 0$ (亦即 γ 相角在二、三象限之數學化表出)則「因子化」為稀有 B 衰變數據所支持;亦即 γ 在第二象限與因子化在稀有 B 衰變中成立是脣齒相依的。

這個宣告,使我們與 CKM 分析所間接推論的 $\gamma \sim 60^\circ$ 起了衝突。然而,到了 1999 年底,所有的 B 工作者已轉而使用大 相角,不再用 $\gamma \sim 60^\circ$ 了。而 2000 年暑假之大阪高能大會中Belle 及 BaBar 實驗所公佈之 $\sin 2$ **b** 值亦遠小於 CKM 分析所預期之 0.7 (小於其半!),不但使 CKM 分析遭到質疑,「新物理」的存在幾乎可說是呼之欲出了。

值得一提的是,自 1999 年起歐美之 Beneke 等作者與東亞之李湘楠(台灣)、三田等作者,分別提出從微擾 QCD 方法,討論「因子化」在 B 介子無魅衰變中大致成立之推演與證明。我們的貢獻,乃是從實驗數據推論(或預告)因子化當成立(若 $\gamma > 90^{\circ}$)。

二、結語:宏觀與微觀

我們所帶出的信息,雖如上述「若 $\gamma > 90^{\circ}$ 左右,則因子化分析可解釋 B 介子稀有衰變率」,亦即 γ 相角可藉樹圖與圈圖(企鵝圖)之相干而僅從平均分支比得出,但我在這裡,還要略為推演一下實驗與理論的互動,以及「見林」與「見樹」在作研究上的不同功用。

在 1997 年之前, 咸信 γ 角是最難獲得的。

但自 1997 年起,實驗數據首先引出如今已失效的 Fleischer-Mannel 限制,而後續十來個稀有 B 衰變分別出現,使得 1997 年回想起來,僅是個序幕 實驗達到一千萬 B 介子衰變數據門檻的序曲。當衰變式如一個個音符般出現時,我們不但要仔細聆聽欣賞每一個音符的毀鏘,或許更重要的,是要去欣賞與體會大自然這音樂大師在樂章中所譜下的悠揚旋律。我相信我們 在眾「樂迷」牽引下 不但聽進了各個音符,更體會出了「作曲家」的一部份心意(大 γ 角與因子化)。這個美感是動人的。

下個樂章即將響起!2000 年已證明 Belle 及 BaBar 兩個「樂團」之實力。我們離一億個 B 介子衰變數據已指日可待。且聽樂聲琮琤中大自然又將再給我們什麼啟示。(不要只聽見音符,要聽出曲子。)

參考文獻

- [1] X. G. He, W. S. Hou and K. C. Yang, Phys. Rev. Lett., **81**, 5738 (1998).
- [2] N. G. Deshpande, X. G. He, W. S. Hou and S. Pakvasa, Phys. Rev. Lett., 82, 2240 (1999).
- [3] X. G. He, W. S. Hou and K. C. Yang, Phys. Rev. Lett., **83**, 1100 (1999).